

評介鮑梅立 *Is Taiwan Chinese?*
*Is Taiwan Chinese? The Impact of Culture,
Power, and Migration on Changing
Identities.* By Melissa J. Brown.

Berkeley & Los Angeles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250pp.

沈 幸 儀*

鮑梅立 (Melissa J. Brown) 於 1995 年畢業於華盛頓大學，現任史丹福大學人類學副教授，同時也是史丹福大學中亞非研究中心的研究學者，主攻社會與文化人類學、人類學理論、社會與文化變遷、族群認同等議題。從 1991 年開始，她開始從事研究臺灣與中國的認同問題。她的著作包括了 1996 年出版的 *Negotiating Ethnicities in China and Taiwan* 及 2004 年出版的 *Is Taiwan Chinese? The Impact of Culture, Power, and Migration on Changing Identities*。

第 1 章主要分析臺灣與中國對臺灣認同的爭論，臺灣雖在文化或民族上源自於中國，但 90 年代後卻在認同上有了重大的轉變。臺灣於 1895 年後割讓給日本。日本在統治期間，特別是皇民化時期，致力於使臺灣人成為日本皇民，對日本產生認同。但因為明顯的差別待遇，反讓臺人產生了「非日本人」之感。1945 年臺灣回歸中國，部分人因二二八事件及國民黨腐敗等因素產生了臺灣意識。但在國民黨戒嚴統治下，「臺灣認同」只是一種強烈的「地區性認同」。80 年代後，「臺灣人」與「本省人」互為指涉，以與「外省人」有所區別，更明顯的突顯出臺灣的主體性。作者認為，中國文化及根源雖然會影響臺灣的認同，但政治與社會經驗也與認同的形成有密切的關係。(頁 9) 臺灣在政治論述上，近年來不斷地強調原住民的文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生

化遺產，以區別與中國的不同。作者試圖釐清漢族的認同，中國的國家認同，與 90 年代的新臺灣認同之間的關係。

第 2 章對臺灣的政治歷史發展提供了一個簡單的介紹，特別關注原住民在歷史發展中的角色改變，並從各個歷史時代來看原住民的認同變化。如在荷領時期，平埔族被歸化到原住民的分類中，比成為漢人更具有優勢。到了清領末期，隨著政策的改變，原住民不再享有過去的優惠和地位。這樣的歷史社會經驗，是平埔族認同轉向的重要因素。劉銘傳改變了土地的租稅徵收方式，造成原住民的收入減少，使得原住民在文化上、社會上、經濟上成了從屬於漢人社會的社群。(頁 53) 日治初期，依據殖民政府的資料，為了解決鴉片和纏足問題，需要調查臺民的「種族」與「階級」。到了 1915 年後，種族不再需要登記，在官方資料中，平埔族和漢人幾乎沒有差別。(頁 54) 至於戰後的國民政府，作者則認為要從中國與日本在 20 世紀前半期的關係來看，才能明瞭國民黨的統治立場與對臺人的態度。(頁 56) 五十年的日本殖民，使臺人無法具備國民黨要求的中文能力，也使臺人在戰後初期失去了在學校、公務機關或甚至是政治、軍事機構服務的機會。曾是日本模範殖民地的臺灣在「回歸祖國」的初期，對腐敗貪污的國民黨感到失望。隨著土地改革、工商業發展、教育普及，臺灣不但創造了「經濟奇蹟」，在政治上也漸漸走向改革與開明。1970 年代，國民黨內開始本土化的工作，一直到 21 世紀的今日，臺灣的認同與主權引起越來越多的爭議。(頁 63)

第 3 章是本書討論的重心，討論平埔族在 20 世紀的認同轉變，作者稱之為「長程的認同轉變」。(頁 66) 作者對臺南縣內的頭社、隆田、吉貝要進行調查，瞭解與漢人通婚的平埔族認同轉變的情況。作者提出，這三個村落在清領時期都還保持著原住民的認同，是甚麼樣的原因讓他們在 20 世紀初期改變認同呢？作者認為日本殖民政府「禁纏足」政策的推行，消除了漢人與平埔族之間明顯的不同，使得平埔族更容易跳脫「番」的地位，取得漢人的身分與認同。(頁 95) 作者所謂的「長程的認同轉變」指的是文化改變早於認同轉變，這三個村落在擁有漢人認同之前，在宗教、習俗或文化上已與漢人相似。入贅到平埔族部落的漢人男子，是早期促進平埔

族文化轉變為漢人文化的重要因素。作者運用平埔族與漢人通婚的比例來分析兩者之間的文化交流情形，此外，作者還分別對入贅和嫁娶的比例進行統計，並對日本殖民政府戶口調查所記錄的通婚情形提出不同的數據和看法。(頁 73)

殖民政府的部分資料提到了平埔族在經濟或語言上受到漢人的影響，但幾乎沒有注意到平埔族在文化信仰與觀念上的改變。作者認為在 20 世紀初，平埔族受漢人影響的文化包括了農業生產、語言、婚姻與居住型態、繼承方式等，而明顯不同於漢人的則是纏足、飲食習慣、喪葬習俗、宗教信仰等。作者進一步分析經過纏足禁令的施行，對平埔族文化及認同所帶來的影響。她的調查顯示在纏足禁令後，平埔族女子嫁入漢人社會的比例增多，也使得兩者間的交流更加頻繁。(頁 99) 這種「長程的認同轉變」明顯改變了平埔族的文化。漢人的性別觀縮小了平埔族女性參與公眾事務的權力，如頭社村中的女性祭司似乎有被男性取代的趨勢。(頁 103) 平埔族的阿立母信仰也被漢化了，不但外型像漢人的廟宇，祭拜方式也與漢人相似，如賭筊、三牲等都顯示出漢化的傾向。(頁 107) 因漢人是父系社會，入贅到平埔族村落的男性為其子女帶來了漢族文化，也賦予子女取得漢族認同的權利。到了 90 年代，頭社、隆田、吉貝耍開始受到媒體與學者關注，但卻被當作平埔族部落來觀察與報導。作者認為這一群人不應該被視為平埔族，因為其認同與文化幾乎都已經改變。

第 4 章則是利用歷史的資料來重建 17、18 世紀部分平埔族認同轉變為漢人的經過，作者稱這一轉變為「短程的認同轉變」。「短程的認同轉變」與「長程的認同轉變」相反，指的是認同轉變比文化改變還早出現。(頁 135) 作者認為在鄭氏時期或者清領初期，這樣的認同轉變已經產生。漢人與平埔族的後代，運用父系血緣而不是文化來取得漢人的身分認同。這些擁用漢人姓氏的人，仍然依照原住民的方式生活，作者用「短程的認同轉變」來加以分析。作者透過荷蘭、鄭氏、清廷等政權的統治來分析原住民認同的改變。在荷治時期，因為漢人賦稅比較重，原住民比較沒有認同的問題。(頁 139) 到了鄭氏以及清領時期，情況改變了，原住民透過通婚來取得漢人身分，改變自己的社會及經濟地位。作者甚至懷疑在鄭氏勢力進

入後，臺灣西南部即出現了「短程的認同轉變」，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尚未開放接眷的清領初期。這時期的漢人移民與原著民通婚比作者前一章討論的時代即 20 世紀要來得頻繁，在極少數漢人女性情況下，漢人男子選擇結婚的對象只剩下原住民。作者認為，原住民女子因為不需纏足，能提供農業生產所需的勞力，也是吸引漢人的優勢。(頁 151) 那原住民為何要與漢人通婚呢？作者提出的看法是漢人具有較高的農業生產技術且具有與鄭氏或者清廷政府溝通的社會知識。相對於頭社等村經過「長程認同轉變」的「漢人」幾乎沒有改變原本的臺灣文化，「短程認同轉變」的這一群人，在作者看來，最起碼在臺灣南部，改變了原有的福佬文化。(頁 155-160) 根據作者的觀察，臺灣南部與北部的福佬文化或甚至是語言都不太相同。舉例而言，北部畜養童養媳的比率遠高於南部。作者認為這些文化差異是因為北部的漢人移民大多攜帶家眷來臺，不同於南部漢人與原住民通婚。臺灣南部在較高比率的通婚之下，使得福佬文化或者說是臺灣文化有了明顯的變化。

第 5 章則是檢視中國湖北的「土家」認同如何轉變為漢人，以及在近年來又回復原本認同的過程。不管是臺灣的平埔族或者是湖北的土家都是漢化後的族群，他們接受了或者實踐了許多漢人的文化與習俗。在歷史上，他們都曾受以儒學為中心的清朝政權統治，但在 1985 年後，他們有了不同的歷史境遇。作者透過他們的共通點與相異處來討論文化、社會經驗與移民的影響。(頁 166-169) 作者在湖北的恩施做了研究調查，以觀察這一區從清代、國民黨一直到中共政權以來的認同轉變。根據作者的調查，這一區的居民有許多漢人移民，透過被強迫的或者自願的方式來到此地，如軍人、農人、工人或者是被流放等，經過與當地「土家」通婚之後，現今的本地人多認為自己是漢人，但在文化習俗上與漢人仍有明顯不同。作者認為恩施的認同在討論上很難找到標準，此地的住民是經過數次的移民及長期的通婚形成的，早一點的移民會自認為本地人，視後來者為外來移民。在官方的認定上也出現了這種爭議，外來者和本地人的身分會影響到官方「漢族」及「土家」的分類。最後中共政權以 1735 年做為分界，比 1735 年早來到此地的歸類為「土家」，之後的則視為「漢人」。(頁 186)

作者以這一地區的案例來點出臺灣政治論述的盲點，在中國的漢文化也是和其他民族不斷融合的結果，臺灣不是例外。臺灣並沒有因為加入了原住民文化遺產而偏離了中國漢文化主流。作者認為臺灣以這樣的論述說明其與中國的不同並不妥當，提醒臺灣應從另一角度去思考。在作者看來，以原住民加入臺灣文化的論述來闡述臺灣文化特殊性與政治主體性是站不住腳的，再加上中國大陸有「非漢族」的族群蠢蠢欲動，中共更不可能願意讓臺灣做類似「非漢族」的政治宣示。反過來看，中國大陸經過十年文革，對漢文化中的重要支柱—儒家—破壞甚多。相較之下，臺灣反而保留了更多的儒家文化，倒比中國更具有「漢文化」的代表性。故作者推翻了原住民與臺灣文化政治論述，認為反不如用漢文化的角度去解釋來得恰當。(頁 209-210) 第 6 章作者則轉向討論理論與政治，分析並得到湖北與臺灣認同的理論架構，運用這個架構，再進一步探討臺灣認同中的政治意涵，以及臺灣未來與中國的互動與方向。(頁 250)

對於近年來爭議不斷的中國問題，作者試圖從認同的問題去探討，包括漢人的認同、中國的國族認同以及 90 年代後比較明顯的臺灣認同。作者對臺灣與中國的歷史發展做了比較，並以人類學家的角度對臺灣南部及中國湖北的村落進行調查研究，進一步探討認同與移民與社會經驗之間的關連性。作者打破過去以血緣或文化作為認同的標準，而從政治與社會經驗的角度來解釋認同轉變的原因與契機。本書對於認同的轉變分為「長程」與「短程」，最明顯的區分方式為文化與認同改變的關連性。若文化轉變，如漢化早於認同轉變，則歸類為「長程」，反之則歸類為「短程」。作者透過這樣的分析比對，來說明認同不一定與文化或甚至是血緣有絕對的關係，有時候社會經驗或政治環境的影響反而更明顯。

作者對於文化改變的觀察十分詳盡，透過口述訪談，以重建當時的歷史情境。包括宗教信仰、風俗習慣、婚姻型態、生產方式等都有清楚的解釋與交代。本書花了很多的筆墨在談原住民，作者似乎希望從原住民的認同型態去找到一個轉變的模式，進而去探究其對臺灣文化的影響與臺灣認同的形成。近年來臺灣的政治論述，傾向於把臺灣塑造成臺灣文化（包括福佬與客家）、原住民文化與日本文化的混合體，以區別與中國（漢文化）

的不同。但作者認為這種論述不論在事實上或者政治上都有問題，大陸的民族眾多，占大多數的漢人與他族血緣或文化的融合或互動的機會頻繁。作者甚至提出在大陸文革過後，臺灣反比大陸更加符合漢文化的精神，而不是如臺灣自己提出的政治論述那般與漢文化漸行漸遠。從作者所訂的題目 *Is Taiwan Chinese?* 來看，本書似乎有替臺灣問題解套的企圖，並指出臺灣的新國族論述在邏輯上的缺陷，用不同的角度來看漢文化與臺灣的關連性。

討論臺灣認同是件棘手的事，尤其是在認同仍然不穩定的今天，認同研究所得到的結論仍予人猜測與想像的空間。作者採用比較特別的處理方式，她利用人類學的研究方法與學術經驗，先釐清「認同」的定義，再用這樣的定義去檢視今日臺灣所提出的認同論述。比較奇怪的是，在這本書中，所討論的主題大部分都以平埔族轉向漢人認同的問題為核心。作者的企圖是要再進一步推論臺灣認同與中國或漢文化之間的關連性，但這樣的論點是否站得住腳？單從平埔族與漢人的認同關係做這麼大幅度的延伸推論，似乎有點危險。

作者想要解決的問題比她實際討論的問題要來得大而廣，造成了此書在論述上的混亂。第 1 章談的是臺灣的新國族論述出現的背景，及其所引發的政治問題。到了第 2 章，作者花了許多篇幅在討論原住民於臺灣歷史發展中的角色，可是她自己也承認，在她的歷史討論中，原住民「消失」了兩次。(頁 63) 第 3 章和第 4 章是這本書的重心，即是「長程認同轉變」與「短程認同轉變」的模式。兩者都以平埔族轉向漢人認同為主軸，但是分析的對象卻大不相同，前者是 20 世紀臺南的三個村落，後者是 17、18 世紀的平埔族。前者以口述和田調的方式進行研究，後者則從歷史資料裡去耙梳。第 5 章還拉到了中國湖北省，討論當地「土家」與「漢人」的認同與分別。就這幾章的編排而言，實在是有點失焦。雖然作者緊扣著「認同」，卻沒辦法突顯出明顯的主體。

再者，作者對其所訪談的隆田、吉貝耍、頭社被視為平埔族感到不以為然，她認為這些人的認同已經改變，應該被視為漢人。作者在這點上看出了臺灣或者中國社會的矛盾，但同時也顯示出研究的盲點。「內在的認

同」與「外在的歸類」不一定都是一致的，那作者又要如何從這些定義去分辨她自己所區分出來的族群呢？換言之，被歸類為平埔族的不認為自己是平埔族，被歸類為外省人的不一定認為自己是外省人，被歸類為中國人的不一定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等。在這樣混亂而又矛盾的衝突下，作者在書中對臺灣的各個族群的界定，如：臺灣人、漢人、中國人、外省人、本省人、高山族、平埔族等，是不是都要重新被檢視呢？

作者認為「禁纏足」政策的推行，消除了漢人與平埔族之間明顯的不同，使得平埔族更容易取得漢人的身分與認同。照作者的邏輯來看，纏足是一種種族標籤，把「漢」與「番」區分開來。「禁纏足」去除了這種標籤，也讓平埔族更容易跨越種族的藩籬，進入漢人的世界。回顧當時的臺灣社會，纏足究竟是不是常態？一般的農家會不會讓女子纏足？如果不會，或者數量不多，那是否有辦法形成明顯的「藩籬」呢？作者在第4章的部分提到，對於17、18世紀的漢人而言，未纏足的原住民女子，能提供農業生產的勞力，也是漢人願與之通婚的優勢。但到了20世紀，纏足卻變成了漢族的象徵，成了隔離平埔族與漢人最明顯的那道牆。根據作者的調查，在纏足禁令推行之前，以入贅到平埔族部落的漢人男子居多，幾乎沒有漢人女子嫁給平埔族，纏足禁令推行之後則有越來越多漢人女性嫁入平埔族部落。從這個現象來看，漢人男性對於平埔族女子的接受度比較大，女性則比較小。可是反過來說，是否代表平埔族對漢人男性的接受度比較大，對「纏足」的漢人女子接受度比較小呢？這究竟是不是漢族對平埔族的歧視，以致不願與之通婚？還是平埔族沒辦法接受纏足的漢人女性，無法提供家庭或生產勞動力等問題所導致的現象呢？

近年來臺灣平埔族認同有了新的轉向，有些人過去自認是漢族，也已經忘記平埔族祖先的語言、文化及生活方式，但在國家政府越來越注重原住民文化且提供更多優惠保障的同時，他們也開始重新檢視或者承認自身的原住民血統，有些學者認為這是「脫中國化」及「去漢族中心」的現象。¹

¹ 林美容：〈漢化 VS. 去漢化/中國化 VS. 脫中國化〉，《臺灣歷史學會通訊》，1998：7，頁9-13。

平埔族從漢文化體系中掙脫出來，長期混淆的「漢人」及「中國人」也從互相指涉漸漸出現區別的界線。近代的國族主義，誠如作者所言，開始跳脫文化與血緣的束縛。繼承自中國的漢文化，過去一直是臺灣國族論述中擺脫不去的包袱。但實際上，臺灣方面已經逐漸形成「近代國民國家」的概念。面對中國大陸的政治主權宣示，臺灣近年來選擇以人民、主權、領土的現代法理概念來提出反駁。臺灣與漢人或漢文化之間的切割或延續，也許已不再是國族建構中最大的問題。此外，作者也許可嘗試從不同的角度去觀察臺灣歷史的發展與延續，如臺灣本身的政治與經濟在歷史中的發展與中國大陸的異同之處，²從更多面向去探討臺灣認同的形成，會有比較清楚完整的輪廓。若單從平埔族的認同研究所得到的結論延伸套用到整個臺灣認同的發展與轉變，立論實顯單薄。

整體而言，本書對認同的看法提出了不同的見解，作者不單對歷史文獻作了考證分析，也實際進行田野調查，以對認同的轉變做更精確的判斷。雖然在論述過程中，討論的主體沒有聚焦，有些論點仍有再斟酌的空間。但在討論方面，跳脫了過去的論述，並提出了新的理論，對長程認同轉變與短程認同轉變的論述，提供了不同的方式探討認同與文化血緣的關連性。而作者從 17 世紀一直談到 20 世紀，能比較連貫而清楚地看見過去留下的文化遺產對今日臺灣認同的影響，展示了臺灣認同研究的另一個面向。

² 鄭欽仁：〈臺灣現代意識的問題—歷史情結與現實的糾葛〉，《臺灣文藝》，1987：106，頁 51-61。